



从无终到蓟州 千年古县的地名漂移与变迁

邵波

蓟州位于天津市最北部,是目前天津辖区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区,也是联合国认定的千年古县。历史上,这里先后被称作无终、渔阳、蓟州和蓟县,而这些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又与周边的北京城区、密云区及河北省玉田县等地存在交集,造成人们在探寻历史过程中认识理解的混乱和偏差。鉴于此,笔者拟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中心,以时间为轴线,简要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相关地名的漂移与变迁。

以山而名的无终

早在商周时期,华北地区出现了很多由原始氏族部落建立的方国,其中活跃在今天津市蓟州区和河北省玉田县等区域的小国叫作无终子国。唐杜佑在《通典》中提到“古北戎无终子国也”,认为无终子国是由北戎人建立的。北戎即山戎,是一群生活在燕山一带、以狩猎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无终子国是由从山西迁移到此的白狄的一个分支建立的。不管是山戎还是白狄,可以肯定的是,无终子国的建立与少数民族密切相关。

关于无终子国名称的由来,《后汉书李贤注》的解释是“无终,山名,因为国号。”认为无终子国的得名与境内的无终山有关。那么,无终山在哪里呢?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尚未定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无终山是今蓟州城区边上的府君山。理由见隋《郎蔚之隋州郡图经》:“无终山,一名步阴山,又名翁同山。”明嘉靖《蓟州志》补充道:“蓟州崆峒山,在城北五里,一名翁同山。……今久呼为府君山,山上有崔府君庙,故名。”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盘山。清朝智朴和尚根据刘之推《九州要记》提到无终山“山上有燕昭王冢,冢去千像寺东南不数里,而人无识之者”的记载,通过千像寺的位置推断出盘山就是无终山。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无终山位于河北省玉田县,依据是东晋《搜神记》中“阳伯

雍无终山种玉”的传说。清《读史方輿纪要》也提到:“无终山,(玉田)县东北三十里。《图经》云:无终子国于此。”

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北部的燕赵等国常受北方东胡等少数民族的袭扰。于是,燕昭王派大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由此开拓了大片北方领土。为加强统治,“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其中,无终子国并入燕国并改名无终县,隶属右北平郡管辖。秦灭燕后,置天下三十六郡,无终县归属右北平郡。楚汉相争时,自立为西楚霸王的项羽封燕将臧荼为燕王,改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建都无终。汉元年(公元前206年),臧荼攻打韩广并在无终将其杀死。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诛杀臧荼,纳其土地,复设无终县。两汉至曹魏时期,这里均称无终县,属右北平郡管辖。关于这段历史地名的沿革,《水经注》在介绍鲍邱水时提到:“迺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子国也。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这段文字不仅提到无终县与无终子国的关系,还提到秦始皇灭燕置右北平郡的时间及无终城与右北平城之间的方位与距离。到了西晋时期,右北平郡改名北平郡,仍辖无终县。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蓟州城区发现一座城址,平面呈马蹄形,东、南、西三面设门,北墙无门。东西最宽处1100米,南北最长处1250米,城墙已完全无存。初步判断,该城址或为这段时期的无终县址。

渔阳与无终的地名东移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废北平郡改渔阳,无终县划归渔阳郡。隋大业三年(607),无终县改称渔阳县,并为渔阳郡治。根据文献记载,渔阳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上海博物馆现存一件名叫“鱼阳钹”的馆藏文物,据信为战国燕早期的兵器,铭文上有“王立子鱼阳口卯,右军工师司马命治得执剂”,便是渔阳早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

关于渔阳地名的由来和变迁,《括地志》这样概述道,“在县南十八里渔水之阳。秦置渔阳郡,治渔阳。二世发闾左戍渔阳,即此城也。两汉仍为渔阳郡治。魏初,郡县俱废。晋复置渔阳郡,仍领渔阳县。(北)齐县废。隋始移渔阳

郡治无终。唐改无终为渔阳,非故郡地也。”再结合《水经注》渔阳“在渔水之阳也”的记载,可知渔阳的得名与渔水有关,而且还与“发闾左戍渔阳”导致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有关。在唐代之前,渔阳县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统军庄村一带。而到了唐代,渔阳县的地名东移至无终县,即今天津市蓟州区。为什么改叫渔阳,《蓟州图经》给出的解释是:“(蓟)州城西北有渔山,郡在山南,故曰渔阳。”显然,《蓟州图经》是通过“渔山”附会《水经注》的“渔水”来延续对渔阳地名的解释,为新的行政区划提供实证依据。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古时渔阳历史文化悠久,又是战事频发的征戍之地,故而“渔阳”常被诗人隐喻为遥远的边塞之地。如杜甫《渔阳》诗:“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白居易《长恨歌》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以及张仲素《春闺思》的“昨夜梦渔阳”,这些诗歌中所说的“渔阳”并不一定专指某一个地方,而是泛指北方的边境地区。

到了唐武德二年(619),将渔阳县东南部分土地划转,新设无终县(县治在今河北省玉田县城)。《太平寰宇记》记载,玉田县“于废无终县置,名无终。”由此,之前原先在隋末被废除的无终县地名向东漂移到玉田县。事实上,在隋代之前玉田县一直都属于无终子国、无终县的管辖范围,所以唐朝将无终的地名转至玉田,在文化上属于典型的“族群迁移——地名漂移”现象,是历史记忆的“在地化”再现。不过,玉田使用无终这个地名只有70多年的时间,到唐万岁通天元年(696)根据“阳伯雍无终山种玉”的传说故事而更名为玉田县。

蓟与蓟州的历史渊源

唐开元十八年(730),废渔阳郡置蓟州,辖渔阳、三河、玉田三县,州治渔阳县。据《太平寰宇记》载,蓟州“取古蓟门关以名州”。明嘉靖《蓟州志》也写道,“蓟门关,在州东南六十里,唐置蓟州意取此。”至于蓟门关,《读史方輿纪要》写道:“《唐志》亦称居庸为纳款,又名蓟门关。《唐十道志》:居庸关亦名蓟门关。”由此可知,蓟州得名与蓟门关(居庸关)密切相关。历史上,蓟、蓟城、蓟县等地名出现的时间非常早。《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则载:“武王追思先圣

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虽然史料对蓟的祖先是黄帝之后还是帝尧之后尚有争论,但对蓟的建立源于周武王的褒封大致是没有异议的。

事实上,在武王封蓟之前,这里已是众多小部落的聚集之地。据传黄帝曾在此“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战争结束后,黄帝将部分部落留在涿鹿之河,这与后来史书中“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相得益彰。对于蓟的名称由来,《水经注》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按此说法,蓟是因城内西北角的蓟丘而得名。蓟丘之名,可能与蓟草有关,以“山多蓟草”故名蓟丘。关于蓟丘的位置,《史记》曰:“幽州蓟地西北隅,有蓟丘。”根据专家考证,蓟丘在今北京市白云观以西、会城门东南一带,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蓟丘因建设需要被削为平地。蓟是个小国,后来被旁边的燕国吞并了。《韩非子·有度》载:“燕襄王(前657—前618)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说明在燕襄王时期,燕国就已经以黄河为边境,以蓟城为国都。关于蓟城的位置,1995年北京市在广安门外滨河公园竖立“蓟城纪念柱”,侯仁之先生书曰:“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名曰蓟,其时惟周。”由此昭告世人,广安门内外一带的蓟城是北京城的起源地。秦灭燕后,置广阳郡,郡治蓟县。两汉时期仍属广阳郡,西晋时改称燕国蓟县,北魏时期称幽州燕郡蓟县,隋代为涿郡蓟县,唐代为幽州蓟县,而到了辽会同元年(938),蓟县被改名为蓟北县,之后又名析津县,从此蓟这个地名就基本不再专指北京了。

与此同时,由唐至辽,蓟州一直存在,并始终以渔阳县为州治。只是在宋金联合灭辽后的短暂时期,曾被拱手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一的蓟州,在北宋宣和四年(1122)被宋朝收回,改渔阳县为平卢县,属广川郡,并为郡治。不过,随着北宋的快速灭亡,该地很快又归金朝统治。到了元代,蓟州、渔阳地名和区位保持相对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与包容。明洪武初年,渔阳县被裁撤并入蓟州,隶属顺天府,下辖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四县。到了清乾隆八年(1743),蓟州改为散州,不再辖县。1913年,蓟州改称蓟县,隶属河北省。1973年,蓟县划归天津市,并于2016年撤县设区改为蓟州区。

地名漂移变迁的原因

综上,简要回顾了从无终到蓟州地名演化变迁的过程,从中发现这里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围绕无终、渔阳和蓟州这几个地名,都出现了原始地名持续东迁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以为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

一是北方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战略重构与动态调整,如隋唐时期将原北京密云一带的“渔阳”符号移植到更靠近边关前沿的无终,形成“地名随防线东拓”的军政联动模式,既延续了“戍边重镇”的历史记忆,又服务于加强东北边防体系的需求;再如唐代借蓟门关的象征意义命名蓟州,其实质是将原属于北京地区的“蓟”文化符号征用东移,强化新设行政区的战略威慑。

二是权力中心隆起引发文化符号的再分配。随着幽州(北京)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其周边地名体系也随之发生结构性重组。为平衡文化资源,一些次级地名如渔阳、无终等专属文化标识逐步让渡给外围区域,从而构建形成“中心—边缘”的文化符号梯度分布,本质是以历史地名的迁移与继承维系核心圈层文化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规范权力影响范围内的政治等级秩序。

三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制度性内因。我国古代常有“借古名冠新地”的地名命名传统,通过“名实分离”实现文化的法理化嫁接。如将无终县改为渔阳县,虽是延续古渔阳之名,实际上则是完全重置其地理位置;再如明初撤渔阳并蓟州,除了满足行政管理需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消除前朝地名文化遗产,构建新的行政认同,进而重塑区域文化的空间记忆。此外,通过蓟州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漂移变迁,也反映出自古以来京津冀三地在行政管理和文化交流方面始终处于相互交织、融合汇通的过程。

如今,这些曾经镌刻在史籍方志中的古老地名,不再仅仅是指示方位的地理标识,更成为彰显蓟州醇厚历史文化的生动注脚。而历经千年的时光变迁,蓟州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享誉世界的辽代木构独乐寺、巍峨险峻的名帅雄关黄崖关、风光隽秀的京东首翠盘山,早已化身穿越时空、联接古今的文化图章,诉说着千年古县蓟州的荣光与辉煌,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序更迭和延绵不息。